

王爱飞等编

中国热

中国人患了伤寒病！忽热忽冷无定时，一朝接一朝，一热跟一热，几时方休？

本书里面有你的影子……



中国潮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第 011 号

中 国 潮
王爱飞 等编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导弹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5.75 字数: 129 千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0

ISBN7—5604—0404—9/I·62 定价: 3.20 元

目 录

- 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前后后 (1)
- 中国邮市大透视 (21)
- 中国外债备忘录 (35)
- 中国西部在行动 (59)
- 中国股市扫描 (70)
- 人情，中国经济的一个灾难 (90)
- 一帆风顺路三千
——涉外婚姻一瞥 (98)
- 炒汇“娘子军” (109)
- “毒潮”侵袭中国 (127)
- 中国人，你在想什么？ (149)

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前后后

重写历史的 1972 年

1954 年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本来可以夺走 18 年后的基辛格、尼克松在历史上的奇异光彩。但这位眼见着“冷战”开了头的美国人，当时却明明白白为手下人规定了不在日内瓦与中国人握手的禁令。

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手，18 年后让尼克松紧紧地握住，便把 1972 年变成了历史人物姗姗来迟的划时代年头。

刚刚经历了赤红赤红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然与太平洋彼岸的帝国主义分子握上了手。这无论对全世界人，还是对全中国人，都绝对是一次爆炸性的心灵震撼。

周恩来和尼克松不约而同地在握手这个小动作上大做文章。这当然还是那一件 1954 年日内瓦阴影留下的遗迹。

周恩来说：“我们握手了。杜勒斯就不敢这样做。”

尼克松说：“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同他握手。”

周恩来说：“不见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也会跟他握手。”

的。”

尼克松于是说：“那好，我们再握一次手吧！”

其实这样的握手并不是在日内瓦开始错过的。

共产党人善于用握手表达他们对世界上敌我友的选择。

在灵活应变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敌我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在以延安为大本营准备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窑洞里的共产党人所确定的独立目标就已经使得他们不能把全部依靠放在苏联一家身上。

在黄土地上的毛泽东就已经对来访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谢伟思说道：“一个进步的战后中国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广阔的经济地区。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能发现我们的纲领中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但是灵活的共产党人也并不仅仅只靠美国人。毛泽东又对美军上校包瑞德表示过：如果美援到不了手，延安还可以向英国或俄国要嘛！

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也许并未注意到这个警告。但是1949年，美国国会内终于不得不为“谁丢失了中国”开始一轮新的争吵。

没过两年，中国共产党人又被卷入朝鲜战争，面对面地与美国人交战。

等到杜勒斯在日内瓦为历史留下一段轶事而不是进行一个转折的时候，中国面向西方的大门只好隆隆地关上了。

但这似乎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意。

共产党人在中国执政，明摆着无法回避中国如何与世界携手的大问题。

从枪林弹雨里活着出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呱呱坠地时就正好赶上世界工业革命的光芒照耀到中国之时。

航海业的发达，火车的出现，电讯通信的萌芽；以至于威力神奇的新式武器，正好在这个时候开始震动大清朝廷。

中国在上世纪后半叶已经不能再孤立于世界。

早一步得到全球地理概貌的西方人已经明白无误地窥见了中国国门内的富庶。

像明代那样或者像清廷开国、立国的几位老祖宗那样以海域当作国门，其实再也无法遮住这挡不住的诱惑。

差不多有 100 年，这诱惑又化作野蛮的洋枪洋炮对国门的袭击。

枪炮下开启国门，也被冠以“开放”这个词——“门户开放”。

但与这种“开放”联在一起的，却是一些让中国人听了屈辱的词：公共租界；治外法权；五口通商……

与这种“开放”几乎同步，中国的疆域日渐其小。《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卷刊出嘉庆二十五年与光绪三十四年两幅不同大小的疆域图。

嘉庆图那只雄鸡还显得很壮硕，远不是我们如今常见的雄鸡状地图的这种清瘦。

几乎让每一个当权的中国统治者都感到困扰的是，以领土为最大标志的主权在不断地被掠走。

疆域的统一，一直是统治者最骄傲和最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这种映照后代的光辉，在清代和民国黯然失色。

所以就难怪刚刚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蒋介石在 1937 年面对日本军队在华北的恣意横行，不得不发出如此决绝的警告：

“中国主权不容牺牲，即使不惜一战，战事一起，誓不回首。”

其实这也是全部中国人的心上的情结。

与外国人打的交道越多，就越容易令人感到收益有限，而失去的却几乎是与生命等值的主权。

但是，这种交道却像魔道一样，紧紧地缠在中国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人从懂事、求知到救己、救国的全过程中，也一直陷在这种情结之中。

即使在芸芸众生中作一个普通人，就已经明白：中国并不能孤立于世界。

依靠战争武器获得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比任何一代统治者都更有信心扩大对外交往，而在交往中获得空前的利益。

但西方明显地惊恐于这个新的巨人。

杜勒斯拒绝接过周恩来的手时，他内心的不平衡其实远远地超过了东方微笑着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再加上中国特色的灵活性，在 50 年代的国际舞台上还算游刃有余。

向西无望，新中国就一心向北方，与苏联及东欧共同在社会主义之路上拓宽通道。

意识形态上的争吵，虽然迫使这一扇北大门关闭起来，但中国还有一个弹丸之地——香港，使得最封闭的年代里泱泱大国还有一条小道通向全世界。

活下来不等于活得好

近 30 年的实绩证明，一个泱泱大国可以孤立地在地球上生存下来。

同时它也证明：一个孤立的大国很难获得较大的发展和飞跃。

活下来和活得好，并不是一码事。

就在这国门关关闭闭的同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正发生着新的巨大的组合。

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石油输出国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地球上的经济活动经过这一个个的纵横捭阖、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利益地盘。

而同时，一日千里的新技术、高科技，也在这几十年间神奇地投入广泛应用。

超音速飞机；电气化铁路线；高速公路；越洋电话；智能化的传真技术；卫星电视转播……把人与人的思想、言论、

行动都更直接、更经常、更紧密地沟通起来。

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缩小，也就意味着地球整个表面积的缩小。

古代人对广阔世界的浩叹，在今天则让位于“地球村”这个气魄浩大的新词儿

当世界已经变成一个鸡犬之声可以相闻的小村落的时候，中国也被逼迫地推向一个新的视野。

对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言，国土的辽阔、人口的众多，如今并不能成为经济格局中受重视的因素。

经济上的实力往往通过钢铁的产量、汽车的流量和高技术的灵光折射出来。

走上工业化道路而称雄世界的发达国家日本、前西德、意大利、法国……都不是自然形态上的大国。

在中国的周围，亚洲“四小龙”，在更狭小的地盘上腾空而起，更让中国人眼睁睁地领教了工业化带来的实力。

本世纪出现在地球上的这些经济奇迹，启发着中国人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路。

台湾与大陆的多年对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和平竞赛。

亚洲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即使看不到万里之外的美利坚、法兰西、德意志的发达，至少也无法回避台湾、香港这些弹丸之地上的繁荣了。

70年代末中国执政者宣布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胆举动，从国际的经验中得到过多少启迪呢？

80年代因此成为中国自觉向世界开启大门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人们接触形形色色洋玩意儿时最初的心理变化，与大清末年王公大臣初次赏玩到自鸣钟、电灯、火车时的惊喜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攀比似的购买电冰箱、电视机，满街用公款换回来的豪华小汽车，甚至新上市的洋豆腐、洋饼干、洋裤子，都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了复杂的感觉。

有多少人热切地盼望拥有一切沾洋味的东西；有多少人同时又热血沸腾地惊叹国格、人格和民族的独立性从何而寻？

在中国，这种“国格”、“人格”当中似乎还掺有社会主义的格调。

1990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首脑的江泽民，一定还记得十年前他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建议创办4个经济特区之后，一些同志当时的怀疑首先就是：“你们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呀？”

为了这种怀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里曾辟出篇幅作具体、细致的解释。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雄辩地在电视屏幕上论证新开辟的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而是经济特区，……这根本涉及不到危害我们国家主权的问题。”

但是，这些自上而下展开的说服能在一朝一夕抹去人们心中的阴影吗？

高楼林立的深圳，有的老同志一游之下泪水潸然：“除了

市政府还有面五星红旗，都变成资本主义了！”

1989年初，海南特区洋浦一块土地出租给日本熊谷组株式会社。地价是以一平方米几美元计算的。顿时，这在许多人士心中激起了波澜。

收钱租出土地，被人们很自然地联系到卖土地、进而再联系到“卖国”这个令人屈辱的词汇。

甚至连筹办特区的官员们，也为了“地租”这个词颇费踌躇。知情人回忆：由于担心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因为过去有“租界”、“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苦思冥想，只好把“地租”改为“土地使用费”。

回忆者笑谓：这在当时也可算得上是个“发明”。

这个“发明”使用在1980年出台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上。

1990年春天的全国人代会上，一份惊呼“鬼子进庄了”的提案，再起波澜。被日本岛广泛关注的这个提案说的是一个现象：进口日本货不只是汽车、电池，仔细想想衣食住行全有。

被日本报界盯上了的是“提案”开出的方子：“45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对付‘鬼子进庄’的办法……”

这种军事上的战胜国沦为经济上的竞赛败俘的心理，仅仅是一两位中国人具有的吗？

经济竞争像武力战争一样，都敏感到触及人的心灵。

也许这两种争斗之中，本来就没有一条很清晰的分界线。

在经历了上百年忧患的中国人眼里，这两种争斗的情景，似乎谈不上哪一种更残酷、更剧烈。

争斗的结局总是生存权的有无。

经济上的败北，同样使人感觉到危亡的来临。

所以，1988年末，中国不少人士中广泛谈论的“开除球籍”的话题，看来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资本家夹着皮包又来了

也许是耸人听闻。

中国人的危机并没有这么快地来到。

而且，意识到危机，也许正是走出危机、迈向富强的一块必要的基石。

7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成就就是意识到必须有一块必要的基石。

“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个口号意识到的，实际上正是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衰落的忧虑。

对外开放作为新的国策，不是很清楚地交织着这种忧虑吗？

开放的重要性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使在1989年6月之后西方社会异口同声地制裁中国，中断一系列往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核心，坚持的还是继续开放的旗帜。

中国已经被卷挟在世界统一流向的商业潮流之中。

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了中国的明确分工。

1990年海湾地区可怖的8月，联合国制裁侵略者伊拉克的决议一作出，世界石油市场顿时倾斜。国际社会忍受着减少石油用量的牺牲要切断侵略者的经济命脉。美国国务卿贝克当即向中国传来口信，建议提高原油出口量。

香港专家事后分析道：“中国宣布没有增加出口，而只是在长期主顾之间‘重新调整’供应量，以便能增加对美国 and 日本的出口。”

更多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在和平事业的携手共进上：

陕西汉中以制造飞机为业的长空精密机械制造公司，与世界的连接，是与美商谈成的一桩积少成多的生意：为新流行的电动牙刷生产精细的小齿轮。中国人和产品的质量，使美国人把分散在瑞典、日本等国的加工厂全部撤销，订货量全部转到中国汉中。

北京一家小有名气的西式家具店个体业主，赚了钱之后不惜以上万美元的开销，自行赴美，为的是开眼界。这可不是仅仅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更大的目的是从美国移植点什么到中国人的眼界里来。

外国商家到中国开设的办事处、贸易分公司已达25220家。这中间包括差不多所有的世界性大公司、银行、工厂。这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市场在这些商家的市场营销战略中占有多大的比重？

80年代的中国，关于外国的知识可谓全民大普及。

一切交往最终都归结到一件件商品、一个个零配件、一

张张货币的交换上来。

零星的商业活动汇聚成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统一行动，终于创造出可观的开放的现实。东部一长条的沿海地带都迅速地改变了职能。

深圳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由村野发展成城市。在中国北方和西部、中部，都习惯把它视作通向香港的桥头堡。

与深圳一样，珠海、厦门、汕头都以整个城市作为“特区”，吸引国外投资者。

从北到南的各沿海城市，辟出一块块荒地改建为开发区，使每一个城市都有了一块进行开放的试验地。

海南岛出租洋浦一块地方，天津出租大沽一块地方，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收取一点日元和美元。

在1990年春天，中国政府将目光从深圳投向上海。在开发浦东、带动大上海腾飞的战略、战术上，不止一两个领导人士提出把深圳筹资建设的模式搬到浦东来。

在这个可观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南部地区至少已与香港紧密联结起来。港府工业署署长鲍明称这种关系为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

这位署长更表示，香港的先进管理技术和拓销才干与中国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能力结合起来，便可产生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这种经济互相依赖的情况并未受1989年6月中国发生的事件所影响。

南部不过是中国向太平洋先迈出的一只脚。

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也各自有了不同的开放目标。大连更多地吸引日本投资。山东半岛吸引的是南朝鲜。浙江宁波吸引的是从宁波走出去发了财的侨胞。福建现在开放的主要伙伴，是海峡那边的台湾商贾……

甚至连 50 年代攻打金门不幸被俘走的解放军士兵，现在也带着多多少少的“台资”上大陆投资来了。

各个地方都有一条最切近自己的开放之路。

以各个地方为单位，中国人在争夺外国伙伴上的竞赛空前地铺开。

一个广交会，能吸引来日见增多的外国商人，却不再能吸引去所有的中国各地贸易力量。

为了更切近自己，东北由黑龙江省出面筹办了一场自己的“北交会”。

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界人士一直在商量举办一个“沪交会”，作为上海、江苏、浙江的“大庙会”。

其实就在各个省，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省交会”。

在迎接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的过程中，中国人细算经济帐的深究，几乎让主办者把它办成一个购物大会、旅游大会。

各自去邀请自己的客人，各自铺筑一条自己的丝绸之路。

这一条条路，从中国大陆辐射出去，越过国境线，越过海洋，就把成块的面积与世界商业大局联为一体了。

这样一种辐射的中心是中国。

如果没有这个中心，我们的开放与 100 年前的开启国门

没有什么两样。

也正因为有这前前后后推进的开放地带，邓小平所以能在1989年大陆出现动乱之后坚持提出开放的战略。他因此能够提出：中国要多造出几个香港。

香港，这个1997年就要结束殖民地生涯的都市，是什么吸引了邓小平呢？

香港灯红酒绿。

香港加工工业发达。

香港的人民生活富裕。

就这些似乎不足以让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浓厚的兴趣。

睿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对这个设想弄不大懂“他讲这话什么意思。现在清楚一点了——如果再来看看香港的发展和现状，就更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再建几个香港。”

在这位老学者的眼里，“其实，香港能有今天，还不是吃大陆‘封闭’的饭，一下子肥了起来的？”

据这位社会学家的印象，直到60年代初香港仍不如上海。但是在后来的10年至15年里却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主要是因为它搞了转口贸易、金融流通以及种种地产生意，后来才办起了一些小工厂。

“近五六年来，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香港把它的工业扩散出去了，却仍把贸易、金融、信息和运输这些现代化的东西牢牢地把持在自己的手里。”

正因为不封闭、因为现代化，香港现在是国际经济生活